

院长

C.P.Snow
The Masters

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6 年版本译出。

Copyright © 1951 by C.P.Snow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纪 念

G.H.哈代

前 言

记得张健先生开始翻译本书时,已经退休多年了。后来,先生到世界各地游历和讲学,所以翻译的进程非常缓慢,直到一九九九年去世,也只完成了初稿。后来,先生的后人又对译稿进行整理和补译,使之有望在先生去世八周年之际付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先生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张健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教育家、英美文学家和翻译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创建山东大学外语系,并主持系务直至退休。他对英美尤其是英国文学和文化理解极其深刻,以研究莎士比亚和海明威见长,素为学术界所推重,译作则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格列佛游记》最为著名。至于他为何在退休后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余选择翻译这位在国内不太知名的作家所写的这样一部同样不太知名的小说,当时的确有点令人费解。现在回想起来,先生选择这样一部译著作为封笔之作并非偶然。先生一生襟怀坦荡,治学严谨,晚年对当时的学术风气深感忧虑和焦虑。记得他每当提到大学中的行政化、商业化和官僚化现象,往往表现出一种担忧、无奈甚至激愤之情。今天,随着这种非学术或者反学术之风日长,大家对此已司空见惯却又无可奈何,有识之士对此多有诟病却也无能为力。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张健先生在晚年还要翻译这样一部书的初衷或者说先见之明了。在此,为了完成先生的遗愿,同时也有助于国内读者的阅读,现冒昧尝试对本书作者斯诺及其思想和作品作一简单介绍。

本书作者查尔斯·帕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1905—1980)是一位英国作家,物理学家和政府官员,但真正使其获得声誉的是他的所谓“学界小说”以及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与阐释。斯诺早年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并在二十五岁时在剑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剑桥从事分子物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先后出任英国政府劳工部技术主管、民事专员等职,一度负责为政府工程选拔科学技术人员。他于一九五七年被封为骑士,后于一九六四年以莱斯特的斯诺男爵的封号成为终身贵族,进入英国上议院。

斯诺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其生活和作品恰恰反映了他对现代化本质的认同,这一点在其《陌生人与兄弟》系列小说以及关于“两种文化”论著中有充分的体现,并且其多重和多变的人生经历也表明,他一直相信科学技术是现代生活的核心。

就其思想而言,斯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小说(尤其是《陌生人与兄弟》系列)反映当时学界的困惑与问题;二是关注“两种文化”的现象,试图为英国式学院寻求发展之道。由于文学人物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斯诺拥有足够的知识与能力在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问题上发表见解。他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1959)及其续篇《再谈两种文化》(1964)构成了其最为著名同时也是受到广泛抨击的观点。他认为,两大学科的学者之间互相知之甚少、沟通困难。因此,斯诺呼吁人们关注西方文化中两大学科之间的裂痕(或称冲突),因为人们虽然早就注意到这一裂痕,但却一直没有一位在两个领域都有建树并受到尊敬的人物予以详述。斯诺的主要论点是,两大学科之间的沟通失语是解决现世问题的主要障碍。他同时也抨击英国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如何改进的一系列建议。斯诺认同第三种文化的观点,主张社会科学和艺术应当关注“人类过去是如何生存的以及当下如何生存”的问题。他的观

点简单而中肯,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天真地认为可以用科学的力量解决所有现世问题。

斯诺在其一生所涉足的科学研究、政府公职和文学写作三大领域均有所建树,但成就并不十分突出,对后世影响较大仍然是他的学界小说及其对“两种文化”这一现象的研究。作为小说家,斯诺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并不顺利,他的侦探小说《帆下谋杀案》(1932)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四十年代后,他开始十一卷学界小说《陌生人与兄弟》系列的写作。本系列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Lewis Eliot(本书译为刘易士·埃利奥特),他是剑桥大学某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其学术与私人生活应该有典型的时代性,是一代甚至数代英国知识分子和“学院文化”的代表。斯诺的小说语言平淡,但并不单调,人物刻画细致入微,大多通过纯粹的细节堆砌表现人物及其活动,对学界的行政官僚和权力腐败作了深刻而平实的描写与揭露。由于擅长对话与场景描写,他的小说有的曾被搬上舞台。

本书写于一九五一年,是该系列小说的第四部。这是一部反映校园政治斗争的小说,其背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行政化或行政本位现象。剑桥大学某学院的院长患绝症即将去世,几位私下活动酝酿出来的候选人为新院长一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质疑竞争这一职位的学者或科学家的资格,也没有怀疑传统大学的价值,冲突点在于竞争双方的视角: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是追求冷冰冰的科技进步还是保持温暖的人文传统,即用文学手法表达了他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在当时,大学仍然是个让人羡慕的地方,教授们严肃认真,充满理想。他们享受着完全自由的工作环境,每星期只需到教室里几个小时,剩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耕耘自己的知识小花园,根本不用担心被解雇,收入却很可观,再加上长长的假期,这个工作的确很惬意、很自在。

然而，大学教授们却仍然苦恼不堪、牢骚满腹。正如我们今天大学中的情况一样，那时的大学教师只有在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并得到所谓终身教授职位之后，才意味着今后的工作可以高枕无忧。作为年轻教师，必须要行事小心谨慎、寻求机会，在工作中则要努力拼搏、十分紧张。但是他们却没有时间和资格抱怨，也就是说，不开心的大学教师不是仍在挣扎着求得一席之地的年轻人，而是那些在大学呆得太久而变得闷闷不乐的“老家伙”。而本书中的主人公就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从其中可以看到斯诺本人的影子，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整个系列小说就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从这一点来看，斯诺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只不过他关注的只是现实的一隅——大学校园罢了。他所描写的现实与我们今天大学校园的情景何其相似，所以对我们这些新世纪的读者来说，他的小说有着双重的现实性：可以窥见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的“学院文化”，同时也有助于审视今天中国的“学术规则”。正如艾里恩·肖特在其研究所谓学界小说的论著《教授旅馆》(Faculty Towers)一书中所说，“大学已经不再是避难地或庇护所，而是开始与喧嚣的城市和快速变化的社会同步”。然而，大学也已“不再是坚固的城堡，已经变得脆弱不堪”。的确，从《院长》一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像管理糟糕的旅馆，完全被愚蠢和疯狂所包围。

“旅馆”中的各色人物进进出出，抱怨和吵闹声不绝于耳。从院长病重的消息公开那一刻开始，十三位有资格的投票人就围绕着两位私下酝酿出来的候选人分成了两个对立的小集团。由于两位候选人势均力敌，随着事态的发展，预测的选票数在七比六、六比六、六比五之间不断变化（因有人退出以及候选人如何投票问题），严肃的选举由此演变成一场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闹剧。幕后活动一直在持续着，开小会、互相串通、个别谈话、夫人外交，不

一而足,在切身利益面前,摇摆、妥协、反目、许诺,甚至模型分析、变化曲线,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在排斥第三候选人(任命外来人)问题上达成一致,但终究要选出一个人当院长。选举的结果并不重要,作者真正关注的是“竞选”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闹剧和角色表演。且看作者叙述中的感慨:“学院选举与政界领导阶层的一些活动十分想象,简直令人吃惊。后来我有幸观察人与人之间更大规模的争斗时,不禁使我想到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再看一下没有胜算的候选人杰戈的无奈:“‘谢谢你们俩,’杰戈说,可是听起来就知道他是在想别的什么。他忽然大哭起来,仿佛又有什么别的使他感到痛苦,‘我又怎么能使我太太忍受痛苦呢?我又怎么看着她受到这样大的打击呢?’”“‘她会不睡等着我的,’他说,‘见到她,她一伤心就会使我受不了。我一生一直想法不使她伤心难过。现在我无计可施了。’”对主角杰戈的心理刻画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写作手法,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最后一线希望”复杂心理:“他很生气,然而仍然抱一线希望,正像一个人在读着一封信,尽管信中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可是他的笑容总要过一会儿才会消失。”再看一下杰戈落选后在庆贺新院长就职的宴会上的表现:“杰戈开口了,大家都听着他说话:‘我想我可以有点特权,这就是我和太太商量的事情。我们觉得你在去别人家之前,应该先到我们那里做客。明天到我家吃晚饭好吗,’他停了停,然后说出最后一个词——‘院长?’”通过这一番表白,落选者的种种复杂情绪跃然纸上。

作者在附录中客观地评说道:“正像布朗所估计的,院长总要破费一些钱财。”“过去院长支配一切,享有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个职位是令人羡慕的、享有盛名的。院长个人是有权的,而且他的言行也是有分量的。”同时也表示出某种乐观:“形式还跟以前一样,但是学院本身正在变,这跟六百年以来它发生的变化本质上是相同的。”作为读者,我们是否也应保持某种

程度的乐观:我们的“学院文化”也在不断变化,并且会不断恢复或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真正健康的文化。

作者斯诺早已作古,译者张健也已辞世,但现实告诉我们,他们的近忧与远虑并非杞人忧天。“学院文化”的现代化是否必然伴随着学术商业化和教育行政化?这是这部小说中间接提及的问题,也是当下国人尤其是学人应当积极思考的问题。作为后辈和后学,我们在阅读他们留下的文字的同时,更应该学习、研读、叩问和光大文字中包含的思考与情感,在忧虑的天空中寻求光明。

这是笔者有幸提前拜读这部小说的一点感想,拉杂写出,不敢妄称作序,权作一篇介绍与广大读者共勉吧。

黄福武

2007年6月于济南

作者小记

我没有给这本小说所提到的那所学院起个名字。我从来就不喜欢像“基督敏斯特”之类杜撰的地名。在刘易士·埃利奥特系列小说中，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用过一个虚构的地名。

小说中的那座学院坐落在实际存在的地方，而那所学院的地形和方位跟实际存在的学院相同，尽管有些细节不尽一致。我所提到的那所实际存在的学院与这本小说之间的联系仅此而已。我谈的这段历史（我曾作简略说明作为附录列于书后，也许会引起一些不熟悉剑桥大学的人的兴趣）与任何一所真正存在的学院没有任何实际联系，尽管我概括归纳出来的一些普遍性原则十分真实，为此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书中人物也是我根据多方面的原始材料塑造的；而我相信近年来不管是在剑桥还是在牛津，任何真正举行过的选举都不是依照这假想的选举程序进行的。早在本世纪初，据说有过一次，选举中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战胜对手的事，马克·派蒂逊的《回忆录》所叙述的那次选举中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而且证据确凿。当我在就小说的主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是 G.H. 哈代第一个提请我注意参考这一事例。我满怀爱慕和崇敬谨将本书奉献给他，以为纪念。

C.P. 斯诺

第一部

院长住宅的灯光

第一章

院长体检后的新闻

雪刚刚停，在我住的那几间房间下面的院子里所有的声音都趋于低沉。简直听不到什么，因为当时是一月初，学院里空荡荡、静悄悄的。我勉强还听得出，是守门人在院子里巡夜，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我的窗下走过。今晚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巡逻了。他手里拿的钥匙不时丁零作响；他的脚步声消失在雪地里以后，丁零的钥匙声仍然传到我的耳边。

那天晚上我没有外出，很早就拉上了窗帘。厨房里的人把饭送了上来，我就在炉旁边读边吃。一整天炉火都烧得旺盛而明亮。虽然快十点钟了，我还是又加了一次煤，紧靠着炉壁用铲子把煤高高地堆在烟囱下面，好让它一连着上几个小时。炉前热得火辣辣的，那儿暖和、舒适而且挡风，驱冷消寒，摆上两把圈椅和一张沙发，就形成了一个安乐窝。这房间是中世纪式的，既高大又古老，如果你从这个安乐窝出来向墙壁走去，就会感到阵阵寒气袭人。炉火正旺，火光照亮了各个阴暗角落，墙壁上的嵌板反射出柔和的、近乎是玫瑰色的光线，但是离炉火这么远也就感觉不到一点热气了。因此，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你会觉得除了炉边那一小块地方以外，房间的大部分都冷得跟户外差不多；还是赶快回到炉火旁边的安乐窝里去吧。壁炉台上放着一盏台灯，坐在灯下就很好嘛；因为你刚从冷风中躲进来，明亮的灯光会更使你感到喜悦。

我坐在圈椅里轻松愉快，多么舒服呀，也就不要再走动了。我在那儿专心致志地读书，竟没有注意到外面楼梯上有脚步声，后来才听到一阵连续不断的急促敲门声，有人在敲门，接着杰戈走了进来。

“谢谢上帝，我可找到你了，”他说。“你在家，我可真高兴呀！”

他走到门外楼梯平台上把皮鞋上的雪踢下来，然后走回房间坐到我对面的圈椅里。他还穿着大学礼服，我猜他们在教员休息室里开了老半天的会。他向我道歉，说他打搅我了。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这样表示歉意未免有些过分了。

不过，在与别人乍一见面的时候，有时他觉得很别扭；他遇见任何人都这样，不用说，跟我见面也是这样，尽管我们俩十分要好。他向人表示歉意喜欢过甚其词，问候别人也过分热乎，然而他这些脾气我早就习惯了。尽管那天晚上他很兴奋，听到了什么消息显得严肃、紧张，但他还是不必要地道歉，寒暄了一番。

他才五十岁。因为他已经秃顶，头发也有些花白了，所以有人觉得他看上去还要老些。但是，判断一个人的身体，第一次的印象是靠不住的。尽管他身材高大粗壮，腆着个不太小的肚子，但是他骨架小，灵便，脚步矫健。同样，他的头很大，两鬓各有一绺金发，脑门夹在中间显得高耸宽阔；但是他脸部表情变化之快，谁也比不了。他总是笑容满面，精神焕发。他戴着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他那一双小眼炯炯发光，显得年轻而活泼。乍一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样子像一位大学评议员。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他是多么的反复无常。他性情急躁，跟他的笑脸一样善变。无论做什么事，他总是神经紧张，而那种紧张在他的神情上表露出来。事实上，人们早已经把他那大学研究员的形象丢在脑后，而开始抱怨他太容易表同情，也太容易动感情了。有许多人不喜欢他爱表现，然而他一往情深地使人们感动，几乎人人都认识到他感情丰富，但要认识到他这人不但感情深厚，而且自尊心很强，却要有些洞察力。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当时他在学院已经担任了十年的高级导师。我是在三年前，即一九三四年和他见面的。那时弗朗西斯·格特里夫知道我想花费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学院法，于是建议学院任命我为研究员，杰戈很支持我。（由于他想象力敏锐，他很快猜到了为什么我快三十了还要改行的原因。）从那时起，他就显然以我的监护人自居，觉得我特别应该感激他。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吗。

“埃利奥特，你在家。能找到你我就放心了，”杰戈站在炉火的另一边对我说。“今晚我必须和你见面。如果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见到你，那我是睡不着的。”

“出了什么事呀？”

“你可知道，”杰戈说，“今天他们给院长做了体检？”

我点了一下头。“明天早上我要去院长住宅探视他。”

“我可以告诉你，”杰戈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去的好。”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他昨天晚上进医院了。今天早上他们给他插下去一根管子，然后让他回家了。今天晚饭以前检查结果就出来了。没有什么希望了。最多——医生说他还活六个月。”

“什么病？”

“癌症。已经不能动手术了。”杰戈脸色灰暗，十分痛苦。“我希望将来我的那一天到来时，情况要仁慈一些。”

我们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我想到院长，他的推心置腹的讽刺，他的节俭和高超的欣赏力以及他纯朴的信仰。我也想到他和杰戈多年来不断地争吵。

我没有说话。杰戈说道：

“埃利奥特，想到弗农·罗伊斯就这样走了，真叫人不能忍受。我不能假装我和他之间每件事都是融洽一致的。这你是知道的，是不是？”

我点点头。

“然而上学期他一反常态帮了我，”杰戈说。“你知道，我妻子病了，弄得我心烦意乱。我帮不了她的忙，我是个无用的人。对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个沉重的负担。就在这时，一天下午，院长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散散步。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散步是有其特定目的的。他要告诉我他对我的妻子是多么感到忧虑，他对她是多么关心。他谅必知道我一直认为她在学院里得不到足够赏识，这是使我伤心的事。当我们信步走到滑铁比奇水滩以前，他用几句话就把要说的话说完。这些话使我大受感动。不知怎的，一个人因为他爱的人而容易脆弱极了。”他忽然非常友好地对我笑了。“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埃利奥特，当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夫人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在她身体好些的时候，你可要再请我到车尔西去啊。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到你家做客呀！她招待我们吃得太丰富了，不是吗？”他说了下去：“那天下午使我对罗伊斯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今天晚上我听到这消息痛苦得难以忍受，你觉得奇怪吗？”

他突然说道：

“你知道吗？正好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又有过一次散步。那时我身体不大好，他像往常一样慢步缓行，而我走得很疲倦。我以为，我们两人之间他要比我健康，任何人都可能这样想。”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今天晚上我们听到对他的判决了。”

他在为这位强悍、机敏、深沉而富有想象力的垂死病人所激动。同时他也沉浸在这一戏剧性的事件中，表现出了他的坦率，而他的坦率却使许多人不安。任何害怕暴露自己感情的人都不能做到这样坦率。

“是的，我们听到了关于他的判决，”杰戈说。“但是还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比其它的事情更为可怕，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听到这一判决。”

他又停了一会儿，然后说：“就是他自己。他们还没打算告诉他。”

我惊叫了一声。

“有理由认为这似乎完全不近人情，”杰戈说。“医生们没有告诉他。只让他了解再过两三个月他的病就完全好了。我们中间任何人去看他，也都要这样说。”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然后看着炉火。我离开他一会儿，打开房门，走出房间，冰冷的寒气扑了过来。我走进仆人的房间，拿了一瓶威士忌、一瓶苏打水和一壶水。夜渐深了，也越来越冷，摸着水壶好似里面的水结了冰。我拿着托盘回到炉火旁边时，发现杰戈站在那儿。他站在炉边，两肘支在炉台上低着头。当我把托盘放在我坐椅旁边的小桌上时，他没有动。接着他挺直了身子，俯身看着我说道：

“这消息使我震惊，埃利奥特，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简直搞不清楚。”他坐了下来，火光染红了他的双腮，他表情呆滞，在沉思。他话语的最后每个词上挂着沉重的忧虑。

我斟上威士忌。他拿起酒杯，映着火光，透过酒看着火苗有一会儿。

“这消息使我震惊，”他又说了一遍。“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简直不清楚。你能搞清楚吗？”他忽然问我，“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发生这件事使我震惊，”我说。

“你一点儿也没有想过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眼神里有一个问题，几乎是在恳求我。

“还没有。”

他等待我的回答。然后他说道：

“今晚在学院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已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的一两位同事。我自己倒没有想到这件事会产生什么后果，但是他们指出院长出缺所引起的后果是不能让我们搁置一边的。”